

苏联学者论通古斯满语民族的起源

通古斯一名是苏境鄂温克人（又译“埃文基人”）三十年代以前的旧称，我境鄂温克人一直到解放初期还沿用这一名称。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则把操通古斯满语的所有民族泛称为通古斯人。

目前，苏境的通古斯满语民族主要有：埃文基人、埃文尼人、涅吉达耳人、那乃人、乌耳奇人、奥罗克人、鄂伦春人、奥罗奇人和乌德盖人；居住在我国境内的通古斯满语民族有：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70—1978年，第三版）所提供的资料，先将苏境的通古斯满语民族概要地记述如下：

埃文基族（ЭВЕНКИ），旧称通古斯人（ТУНГУСЫ）西伯利亚民族。埃文基人的居住边界，西至叶尼塞河左岸，北至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极圈以内的冻土带，东至鄂霍茨克海南部沿岸，南至阿穆尔河及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北部。人口（苏境）25100人（1970年统计）。一部分埃文基人居住在中国东北（即鄂温克人）。埃文基人操埃文基语。传说埃文

~2~

基人起源于贝加尔湖流域和后贝加尔地区。可能在公元两千纪初，他们从那里迁至现今各地。傍加入俄国（十七世纪）前，埃文基人分化成一些父权直系外婚氏族，过着游牧的生活方式，从事养鹿，狩猎和一部分捕鱼业。从十七世纪初开始信仰东正教，但保留了基督教以前的各种信仰（萨满教等）。1930年，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成立了埃文基民族州。十月革命以后，为埃文基人创造了文字，扫除了文盲。许多游牧的埃文基人定居，从事农业、养畜业和养兽业。

埃文尼族（Эвены），旧称拉穆特人（Ламуты），北西伯利亚的民族之一，居住在马加丹省的某些地区以及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北部地区（勒拿河以东）。人口12000人（1970年统计），操埃文尼语。民族起源与文化均与埃文基人相似。过去的主要生业是养鹿和狩猎，沿河沿海的埃文尼人从事捕鱼和猎取海兽。埃文尼人（从十九世纪起）表面上承认东正教，但保留了基督教以前的各种信仰（萨满教等）。三十年代时，为埃文尼人创造了文字，扫除了文盲，许多埃文尼人定居，从事养畜、养兽业和农业。

涅吉达耳族（Негидальцы），自称埃利坎人（Элькан），贝埃宇人（Бэйэнин），沿阿穆尔河与阿穆尔河（哈巴罗夫边区）居住。人口500人（1970年统计），语言属于

通古斯满语语族，非常接近埃文基语。涅吉达尔人起源于迁往阿姆贡河沿岸并与当地尼福赫人、那乃人、乌耳奇人融合的埃文基人。十月革命前他们从事狩猎业。涅吉达尔人正式承认过东正教，但保留了万物有灵和萨满教等信仰。

那乃族 (НАНАЙЦЫ)，自称那乃 (НАНАЙ)，旧称果尔特人 (ГОЛЪДЫ)。该民族主要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 (哈巴罗夫边区) 和乌苏里江右侧支流沿岸 (滨海边区)。人口 (苏境) 约 10000 人 (1970 年统计)。一部分那乃人居住在中国境内，位于松花江与乌苏里江之间。操那乃语，很大一部分人也讲俄语。尽管二十世纪初在那里推广了东正教，但在那乃人中间萨满教的信仰仍占主要地位。在民族起源上，那乃人象是阿穆尔河流域古代土著居民，即通古斯——满人的后裔，那乃人主要从事狩猎，养畜业和农业。

乌耳奇族 (УЛЪЧЫ)，亦称奥耳奇 (ОЛЪЧЫ)，自称那尼人 (НАНИ)。该民族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哈巴罗夫边区的乌耳奇区。人口 2400 人 (1970 年统计)。乌耳奇语属于通古斯——满语语族。乌耳奇人过去普遍信仰万物有灵和萨满教，民族起源于森林通古斯人，古代土著居民和其他一些民族成份。乌耳奇人目前主要从事狩猎业，10% 的人口住在城市，形成了民族知识分子队伍。著名作家 А. Л. 瓦耳久就是

乌耳奇人。

奥罗克族 (ОРОКИ), 自称乌耳塔人 (УЛЪТА), 少数部族, 人口约 400 余人, 主要居住在萨哈林省的东北部。奥罗克语属于通古斯——满语的南部分支。奥罗克人同奥罗奇人、乌德盖人一样, 有时被误称为鄂伦春人。奥罗克人的部族基础, 有可能是由一些同外来的乌耳奇人, 厄福赫人融合了的通古斯人或拉穆特人组成的。该部族从事牧鹿、捕鱼业和猎取海兽业。

奥罗奇族 (ОРОЧИ), 自称那尼人 (НАНИ)。该部族主要居住在哈巴罗夫边区苏维埃港湾区和共青团区。人口 1037 人 (1970 年统计)。人们常常把他们同奥罗克人、鄂伦春人混同起来。奥罗奇语属于通古斯——满语语族。奥罗奇人是融合部族, 在其部族成份中, 不仅有当地的, 而且有外来的 (主要是) 通古斯人。在文化方面, 奥罗奇最接近于乌德盖人。他们的传统生业是捕集和狩猎, 还有种菜和家庭养畜业, 过去还从事海猎。

鄂伦春人 (ОРОЧОНЫ) 一名来源于埃文基语——奥伦一词 (ОРОН)——鹿的意思。鄂伦春是十月革命前对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 (今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巴翁托夫区、赤塔省和阿穆尔省北部地区) 使鹿埃文基人的称呼。

乌德盖族 (УДЭГЕЙЦЫ), 自称乌德埃 (УДЭЭ)。

乌德赫(УдхэХэ), 该部族沿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右侧支流居住在滨海边区和哈巴罗夫边区。人口1500人(1970年统计), 操乌德盖语。乌德盖人宗教信仰的特点是崇拜自然力和动物, 信仰萨满教。部族起源于当地土著居民和通古斯人, 主要传统生业是狩猎和妇女采集业。

苏联学者普遍认为, 通古斯人的民族起源问题是亚洲民族史中一个极其复杂的争议问题。十八世纪以来, 俄国及苏联的许多学者极为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 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著作, 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和推测, 并研究了这些民族历史的不同侧面。^①

1851年, 俄国出版了H. Г. 比丘林(1777—1853年)的《中亚古代民族史料集》。这是一部根据我国古代历史资料编译的多卷本著作。这部书对后来的许多俄罗斯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直到今天仍然是苏联那些不能直接查阅汉文资料的东方学学者的必备文献。比丘林在这部著作中不仅大量地转译了我国有关北方民族的史料, 而且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东胡不是通古斯人, 而是蒙古人, “就是统治东部蒙古的鞑靼汗王室”^②。

汉学家B. П. 瓦西里耶夫(1818—1900年)则认为, “古代的东胡不仅仅是一个满族”, 契丹(蒙古)人也是它的

基本民族成份之一。^③

从此，通古斯人南来说在俄国占了优势。西伯利亚历史学家菲舍尔就认为：“通古斯人的故乡是满洲”。当通古斯语同蒙古语、突厥语的亲缘关系为M·A·卡斯特伦（1813 — 1852年）确认之后，特别是通古斯语同满语之间的同源关系被揭示以后，通古斯人起源于南方之说在俄国几乎成了定论。游牧在西伯利亚的所有通古斯人，都是以前从肥沃的满洲黑龙江沿岸迁徙而来的。^④

1888年，希基什发表了《通古斯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通古斯人起源于南方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希基尔也认为满洲是通古斯人的故乡。“通古斯人迁往西伯利亚的时间是在西辽时期，即十二世纪初，他们所带去的文化很快就衰变了”。他认为，通古斯过去有过高度的文化，从他们的敞襟衣服和宗教信仰上就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的遗迹。通古斯人敬天、敬地、敬日月等都同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相类似。

继希基尔之后，将近半个世纪，在俄国很少有人研究通古斯人的族源问题，Л·И·什连克（1826 — 1894年）在他的《阿穆尔边区的异族人》这部著作中，也只是简单的指出：“虽然这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以外，远达叶尼塞河流域，北冰洋沿岸和堪察加地区，到处都可以见到通古斯人；但必须指出，

他们的故乡是现今的阿穆尔河流域及其支流沿岸”。他认为，最初居住在中央亚西亚的古亚细亚人是第一支涌入东方的古代民族，第二支才是通古斯人。从此叶尼塞河以东便成了通古斯人的世界。

总之，在П. П. 施密特以前，俄国学者对通古斯人的族源问题不是保持沉默，就是认为“满洲是通古斯人的故乡”。

施密特首次提出，早在公元初，所有西伯利亚地区和阿穆尔河流域都居住着古亚细亚人。所以，通古斯满族的故乡不可能是现今的满洲。他指出：满语中很少有古汉语词汇，从汉语借用的词汇一般都属于公元500—1000年间的词汇。满语中的朝鲜语成份也很少。这说明，早在公元初满族人并不居住在满洲，也不与汉人为邻。汉族人早在公元很久以前就占据了满洲的南部。满族人同朝鲜人的直接联系也是在较晚期进行的。施密特认为，挹婁人和渤海人属于朝鲜人，并不是通古斯人。

施密特写道：“我发现，古代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民族的故乡大约是在阿尔泰地区以南，而通古斯满语部落的故乡可能是色楞格河流域。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许多通古斯语地名。从这里又分化出若干部落。他们的后代就是现今的鄂温克人、鄂伦春人、马涅格尔人、拉穆特人、萨马基尔人和涅吉达耳人。另一些部落沿阿穆尔河而下，进而占据了现今的

~B~

满洲。在那里，形成了满语部落，即后来的满族人、赫哲人、奥罗奇人、奥罗克人、乌德盖人等。一些汉语词汇后来又渗透给通古斯语。通古斯人很可能融合了一部分古亚细亚人，同时吸收了他们的一些语言成份。例如，词首的‘HГ’音，又如把词尾音‘T’、‘П’、‘K’等变成‘P’。通古斯人和满人毕竟是一个群体，但又不应该把他们混为一谈。另外，女真人只是满族人的祖先，绝不是所有满语部落的祖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原始的通古斯满语民族”⑤

1929年，B·И·索斯诺夫斯基发表了《鲜卑——鄂温克人》一著。他认为，鲜卑和鄂温克人属于同一民族。在鲜卑人檀石槐所建立的大国里面，除了鲜卑人部落以外，还有西部的一些突厥语部落和东部的一些通古斯语部落。当时的鲜卑一名乃是所有这些部落的统称。这些通古斯人（即鲜卑——鄂温克人）形成于远古时代，其中有当地的土著居民，也有来自西南的远方居民，鄂温克人的最后形成地域可能是在外兴安岭地区，即鄂嫩河与克鲁伦河流域。其当时的部落名称就是现今开特人所谓的“赫文贝人”（用俄文拼写即：Хевенбэйцы），也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鲜卑人”。公元一世纪时，鲜卑人就从这里同丁零人（开特人的祖先）和中国人一起击溃了匈奴人，征服了蒙古及其毗邻地区。后来，这部分鲜卑人伸入到贝

加尔湖地区，同化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并与丁零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五世纪中期——六世纪，他们之所以来到维季姆河和奥廖克马河流域，这一点同突厥人和昭武人的一些部落迁往东北方是分不开的。^⑥

同年，C. M. 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1889—1934年）发表了《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一书^⑦。作者在这部书中研究了那乃人与满族人文化的异同点。他把那乃人分为三支：阿穆尔群体、乌苏里群体、松花江群体。希罗科戈罗夫认为，那乃人具有如下纯属通古斯人的一些特征：以鱼为主食，以桦皮作器物，加工鱼皮、寡妇内嫁、特制的悠车等等。同时，他们又吸收了南方通古斯人和古亚细亚人的文化；在那乃人的语言中，除了通古斯语成份以外，还具有满语和古亚细亚语成份。

按照C. M. 希罗科戈罗夫的假说，通古斯人的祖先离开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之后，分别迁往更远的北方和东方。迁往东方的一支行留在现今的满洲山区。因为，当时那里最好的河流和土地已被古亚细亚人所占据。后来，他们逐渐同当地的古亚细亚人融为一体，并同古代的蒙古人和突厥人有了密切的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丧失了原来的民族共同体，简化了本民族的语言的复杂形态。并采纳了一些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后来

又同汉人有了接触，最后形成了通古斯人的南支。

迁往北方的一支看来行动得非常缓慢。北迁之后，他们又向东方迁移。大约是在十世纪以后，两支通古斯人又在三江（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松花江）汇流地区相遇了。

这时古亚细亚人的影响已经大大低落，通古斯人可以反过来影响他们。在南方通古斯人的影响下，又使一部分北方通古斯人（那乃人等）的语言实现了南方化。

希罗科戈罗夫认为，通古斯人的原始故乡在现今的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他们还占居着中国的中部地区。当时，中国的北部，东北部、朝鲜和东西伯利亚等地到处居住着古亚细亚人。后来，在来自西北的汉人压力下，古通古斯人不得不放弃故地而北迁，之后，又分别东迁和北迁。他指出，通古斯人的敬襟衣服就是从南方带过来的。

Г. М. 瓦西列维琦激烈反对С. М. 希罗科戈罗夫的上述论断^⑧。他指出，敬襟衣服并不是来自南方，而是出于勒拿河流域。А.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已故）又通过考古学资料继续论证了这一观点^⑨。

瓦西列维琦指出，通古斯语的分佈地域极广，其方言也颇多，而且大多数通古斯语言又没有文字。在通古斯诸语言中，

保留了大舅的古代词汇。这些词一方面反映了这些民族本

身的历史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民族同其他古代民族的种种联系。这些联系在通古斯满语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一些民族在历史上不见了，但他们的语言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逝。

在通古斯满语中，同其他语言成份相比，北亚语成份只占很小的比重。通古斯满语不仅含有阿尔泰语和乌拉尔语成份，而且具有古亚细亚语成份。这说明，通古斯满语、蒙古语、突厥语在古代属于一个语言体系，而且先通古斯语是在阿尔泰语的基础上形成的。通古斯语最初形成于贝加尔湖沿岸及其毗邻地区：东到阿穆尔河沿岸的原始林区，西至安加拉河沿岸的原始林区。

现代古亚细亚人的祖先同先通古斯人是混居的。远古中央亚细亚民族的迁徙迫使安加拉河沿岸——贝加尔湖沿岸的先通古斯人沿安加拉河西迁，沿勒拿河北迁，沿阿穆尔河东迁。先通古斯人的北迁迫使一部分古亚细亚人的祖先迁往更远的北方。在新的条件下，这些先通古斯人不是同化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就是同对方融合在一起，或者被对方所同化。

Г·М·瓦西列维琦还从民族学角度对通古斯人的民族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她认为通古斯族的起因在于北方狩猎通古斯人和南方养畜通古斯人的隔绝。通古斯人发明了弓箭，桦皮

船、雪橇、悠车等。这些器具构成了通古斯人的文化特征。迁到东南地区的一些通古斯人群体，落到了一些异己部落中间。这些异己部落另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这部分通古斯人同自己的同源民族失掉了联系，另有自己的发展史，后来形成了一些满语部落。可是，南北通古斯人的语言是分不开的，尽管两者出现了一些差异。然而，在民族文化方面，这些满人部落仅仅保留了悠车。

中国人的悠车是从满族人那里传入的。悠车的发展和最后定型可能是在先通古斯人迁离贝加尔湖流域之后，因此它在各地的名称也不一样：埃文基语和涅吉达耳语为“ OMKe ”，奥罗奇语为“ OMYXOM ”，乌德盖语为“ OMYTOM ”，奥罗克语、乌耳奇语、那乃语为“ OMYOM ”。

上面已经透露了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观点。这位不久前故去的学者认为，现今的鄂温克人就是贝加尔湖沿岸的古代居民（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者）的直接后裔^⑩。

1969年，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在《从最新考古研究成果看通古斯满族问题》^⑪一文中写道：石勒喀河沿岸的一系列发现表明，这里属于单一的文化区，即先通古斯文化区。这种文化一直向东延续到阿穆尔河上游。这一地区是远东部落（及其文化）同西伯利亚部落（及其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带。奥

克拉德尼科夫认为，贝加尔湖沿岸和后贝加尔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很可能是“先通古斯人，即东西伯利亚原始林区的土著居民。

H. G. 比丘林等曾把通古斯满语民族分成北方通古斯人（即通古斯人）和南方通古斯人（即满族人）^②。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接着写道：满人有史以来就以农耕和养畜为生。他们最喜欢养猪，其主要农作物为是黍。这里的农业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起源于赤峰和林西的新石器时代。这些生产与生产传统后来为一些晚期的满人部落所承袭，这些人就是中国文献史料中最早出现的那些古代满语部落。

他认为，南北通古斯文化的“分水岭”是农业。

1971年，A. П. 杰列维扬科在题为《古代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早期铁器时代通古斯人就已经扩展到阿穆尔河沿岸及其以南的满洲，公元前两千年末——一千年初，在现今苏联远东的南部存在一种铈杰米文化，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存在一种乌里尔文化。这两种文化的起源彼此接近。

乌里尔文化的特点是广泛使用骨制劳动工具：骨针、骨锥和骨制箭头等。另外在一些居址中还发现了骨制甲片等。铁制劳动工具发现得不多。主要劳动工具还是石制的：有截面呈长方形的石斧，精心琢磨过的石刀和石针，石制网坠、石杵、石

制碾磨器和磨棒等。同骨制箭头并用的还有石制箭头，其中有菱形的，也有三角形的。大多数劳动工具都是用磨光了的页岩制成的。陶器的形状和纹饰各不相同，其主要特点是体积较大。器身呈球形，颈部较细，器底不大，底径与口径相近似，双唇口沿外侈，器壁一般都是磨光的，上面覆有红色或深红色颜料。在同一文化的某些居址中，还发掘出一些罐状容器和钵状容器。陶器上最流行的图案是曲线纹，其次是同珠状纹交替排列的附加堆纹，第三种图案是用横线构成的各种组合纹饰。

Е. И. 杰列维扬科指出，乌里尔文化的许多成份都同滨海地区的扬杰米文化相类似：1)、陶器的形状和纹饰；2)、截面呈长方形的石斧；3)、用骨料和页岩制成的工具；4)、一样的住房结构；5)、独特的铁制铤状工具等。这一切说明，持有这两种文化的古代部落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具有一样的生活习惯和经济体制。^⑬

在乌里尔文化和扬杰米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波尔米文化——铁器时代文化。公元前七至四世纪时，波尔米文化取代了乌里尔——扬杰米文化。波尔米文化取名于犹太自治省的一个叫作“波尔米”的小地名。在这里一共发掘了十一处房址，其大部分毁于火灾^⑭。Е. И. 杰列维扬科指出，波尔米陶器按其形状和纹饰可分为三种。第一种类似弥生式陶器，器身呈

球形，口沿呈直筒状或外侈，类似盘状。这种陶器一般都饰有各种直线纹或波浪纹，直线纹之间往往穿插一些附加堆纹和珠状纹。第二种是一些器身略有弯曲度的容器，上面饰有跳棋棋盘式图案。第三种是一些大小不等的钵状容器（上面饰有指压纹）和罐状容器。制作劳动工具和兵器的主要材料是铁。用铁制作箭头、镞、渔钩、刀、长剑、锥子、针、甲片等等。村落里的居民从事狩猎业，但农业在其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在房址中、容器中，就是在屋地上也可以见到被火烧糊了的黍类。在阿穆尔河的中下游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波尔采期文化遗存。这些文化同乌里尔文化一样，在阿穆尔河流域分布得十分广泛。波尔采文化部落不仅居住在阿穆尔河沿岸，而且居住在滨海地区。

E·И·杰列维扬科认为，公元前二千——一千纪，即早期铁器时代，在远东南部，以乌里尔文化、扬杰米文化和取代它们的波尔采文化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大的民族共同体，假如把这一民族共同体看成是肃慎和挹娄（即通古斯满语民族），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乌里尔——扬杰米文化和波尔采文化就应该同靺鞨遗存相一致，而且靺鞨各部落的文化也应该同上述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保持渊源上的联系，但是这一点根本未能被考古学资料所证实。看来，靺鞨文化的形成地域不是在远东的南部。

公元初，在远东南部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部落，这些部落持有一种新的与上述文化不同的文化。这就是靺鞨与靺鞨人的文化。靺鞨人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公元初安加拉河沿岸和阿穆尔河沿岸的草原地区被突厥人的一些部落所占据。骨利干人楔入这些地区之后，迫使通古斯人离开贝加尔湖地区西迁和东迁。看来居住在东后贝加尔、内蒙古和满洲西北部地区的布尔霍图伊人和鲜卑人在古代是一个祖先，具有统一的文化，后来，这些东迁的部落吸收了当地部落的一些文化。例如，布尔霍图伊人并没有钵形器，也没有轮制陶器。如果把靺鞨人的奈费尔德陶器同布尔霍图伊陶器相比较，就可以看出，靺鞨人从波尔米文化那里吸收了一些有别于布尔霍图伊文化的特点和传统。然而，特罗伊茨基和奈费尔德等地的制陶传统却成了渤海人和女真人的制陶基础。阿穆尔河沿岸的靺鞨人吸收了乌里尔文化的一些饰陶要领。例如，在许多器器上都以带状附加堆纹取代了棱状附加堆纹。

总之，在中央亚细亚、贝加尔湖沿岸和阿穆尔河上游等地，很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然而民族的划分并不总是同经济划分相一致。靺鞨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居住在平原地区的一些部落从事农业，居住在山区和原始林区的一些部落则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某些群体随着居住地点的变更其经济类型

也有所改变。^⑤

1973年，苏联学者刁·B·沙弗库诺夫在《苏联学者论女真人》一文中写道：“满清人……力图证明，女真人以及后来的清皇室，都起源于古代的肃慎部落……为了使这一说法更有分量，还竭力从语言文字上查找证据，进而证明古代的“肃慎”，就是后来的“珠中”、“朱里真”、“女真”。后来，这种假说便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定论”。

“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有人试图把“朝鲜”族一名的来历同古代民族“肃慎”联系在一起”。

“然而，无论是前一观点的持有者还是后一观点的持有者的论据，都很难令人信服。因为，把古代肃慎人的地域考定在现今满洲境内的作法同古代中国文献史料的记载显然是矛盾的”。

沙弗库诺夫接着写道：“据《后汉书》记载，肃慎属于‘东夷’部落联盟的一支，殷帝武乙时（公元前1198—1194年）住在淮河、岱河谷地。换言之，他们的地域位于黄河口以南泰山附近的中国低平地区，可能还包括山东半岛的一部分。关于周代早期‘东夷’部落的分布问题……B·M·克柳科夫写道：古代中国人按东西南北把毗邻的‘夷人’部落分为四下，……在汉代仍然采用这种方式来划分人类居地。然而，由于这时中华帝国的版图已经扩展得很大，其东境被人为地移向东